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整体视角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意义实际上关切了世界视野、世界意蕴和世界贡献三个维度,应从生成逻辑把握其世界视野,从思想内涵把握其世界意蕴,从国际影响把握其世界贡献。

一、从生成逻辑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视野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魂脉”具有世界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文化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中继承了其世界性的精神品格。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认为历史是世界的。基于对世界历史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世界性的文化交往使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融合、共享,各文化主体的文明成果相互交流、借鉴、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价值高度,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根脉”具有世界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文化根基和智慧源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更超越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从世界观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性世界观,认为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共处于一个大的生命共同体,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整体性存在。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合、求大同”,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时强调协和万邦。这也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处世交往之道。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实关照具有世界性。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发展,所处国际方位明显改变,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威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与此同时,“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被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大肆鼓吹,阻碍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文明具有差异性是客观现实,但差异不是高低、优劣之分,而是地域、特色之别,不等同于隔阂和冲突。习近平文化思想胸怀天下,人类社会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面临的时代呼唤之一。

二、从思想内涵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意蕴

文化自信论彰显世界意蕴。“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坚定文化自信不仅需要保留文化自身的民族性、独立性,还要放眼全球完善自身,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构建令外部国家及民族文化群体产生认同感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获取世界性的广泛认同。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一方面要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要使用更富时代感、更具共通性的全球性话语,讲活中国故事,使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同。

文化价值论彰显世界意蕴。“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天下情怀和世界担当。和平与发展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价值基础,是世界各国共同肩负的事业。没有和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无法保障,更何谈人权、何谈发展。没有发展,和平也将很难实现。公平与正义是各国追求的基本社会价值,也是国与国之间往来的规范价值,公平与正义影响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世界人民追求的共同理想。民主与自由是各国政治生活追求的核心价值,也是国家之间往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

文明发展论彰显世界意蕴。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文明发展过程中通过交流互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实际上是对西方文明逻辑的超越。西方文明背后的逻辑是“资本至上”,将“技术的胜利”凌驾于人的发展之上。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劳力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成为了西方文明的主体和目的,人成为了资本增殖的客体和手段。人类文明新形态背后的逻辑是“人民至上”,将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本质,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质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社会主义文明以“人民至上”超越了西方文明的“资本至上”。

三、从国际影响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贡献

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注入中国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发展,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中国文化的魅力助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是以创新理论充分展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实际、把握时代特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二是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的新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制胜的“最大法宝”,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与互相成就。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坚持“两个结合”不仅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旺盛活力和蓬勃生机,也保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自信,打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的创新空间。

为应对世界共同文明挑战提供中国方案。一是在顶层设计上,发展中国家要将文化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战略布局。结合现代信息传播特点和趋势,将维护文化安全的主战场聚焦于新闻宣传领域尤其是互联网舆论平台。二是注重挖掘本国历史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必须兼顾本土文化传承与当代发展,必须守护好本国历史和文化精神根基,激发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心,更好地应对外来文化安全挑战。三是重视价值观的培育。价值观作为“最大公约数”,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追求与行为规范。在各国民文化交流频繁且深入的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需要筑牢自身价值观的根基,另一方面也应积极拥抱并遵循超越地域、民族与文化界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这样不仅能够有效捍卫本国文化安全,也能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与和谐发展保驾护航。

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一是揭示了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世界文明史本就是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谱写的。不同国家和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性,这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因此,人类文明一定是多样化的,这种多样化是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不能将文明差异视为文明冲突的根源,企图去改造、同化甚至是取代其他文明,而应该使差异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二是揭示了交流互鉴是世界文明的繁荣之路。文明的差异性不意味着任何文明都是过时独立的孤岛,而是给各文明之间的接触、互动和交流提供了可能。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这一人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强调“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基金项目:2024年度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课题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意义研究”(项目编号:QS2024105)。

【作者单位:中共芜湖市委党校(芜湖行政学院)】

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制度构建

■ 毛惠勤

党史学习教育从集中性教育向常态化教育延伸,是应对意识形态风险、巩固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当前部分党组织仍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灌输轻转化等问题,亟需通过制度重构破解“用学脱节”困境。本文聚焦制度供给与执行效能,探讨如何将党史学习教育深度嵌入党的治理体系。

一、价值定位:制度构建的政治逻辑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防火墙构建

历史虚无主义以解构叙事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其本质是通过否定历史必然性消解政治认同。制度化党史学习教育通过构建完整的历史解释框架,在三个维度形成防御体系:一是确立“四个选择”的历史叙事主线,强化发展道路的正当性;二是以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批驳“历史终结论”,彰显制度优越性;三是通过精神谱系传承塑造集体记忆,形成抵御错误思潮的认知共同体。

(二)政党现代性转型的文化支撑

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党史学习教育承担着双重功能:既是政党文化的再生产机制,通过红色基因传递保持组织特质;又是治理经验的萃取平台,将历史智慧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这种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要求建立历史经验与现实治理的对话机制,使党的创新理论与历史实践形成解释闭环。

二、实践困境:形式化痼疾的制度溯源

(一)内容供给的“三重脱节”

当前教育内容存在结构性缺陷:时间维度上偏

重革命史而弱化改革开放史,空间维度上强调全国性叙事忽视地方党史特色,主体维度上采用统一教材难以满足不同群体认知需求。这种供给失衡导致教育内容与党员日常经验疏离,削弱历史教育的现实解释力。

(二)参与机制的“主体性悖论”

现行组织模式陷入两难困境:强调纪律保障参与率,却催生被动应付心态;倡导自主学习又面临参与动力不足。其制度根源在于考核体系重过程轻结果、重形式轻转化,未能建立学习成效与个人发展的实质关联,导致党员在“政治任务”与“真实需求”间产生认知割裂。

(三)效果评估的“量化困境”

现有评估体系存在三重局限:指标设计停留于知识记忆层面,缺乏价值内化程度的测量工具;评估周期与教育成效显现规律不匹配,短期考核难以捕捉行为改变;反馈机制缺失使评估结果无法转化为改进依据。这种测量失效导致教育质量陷入“黑箱”状态,制度优化缺乏数据支撑。

三、制度重构:常态化机制的实现路径

(一)内容生产的动态更新机制

建立兼具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内容体系,中央层面统一编制基础知识模块,聚焦党的历史决议、精神谱系等核心内容;地方层面鼓励挖掘本土红色资源,开发特色教育产品。同时设立专门的内容更新委员会,按期对教材进行系统性修订,及时将最新理论成果、重要实践经验纳入学习内容,避免教育素材滞后于时代发展。

(二)参与激励的双向驱动模型

构建组织约束和个体成长的双重激励模式,需在

组织层面,将党史学习成效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硬性指标,建立学习积分与职业晋升的量化关联机制;在个体层面,通过专题培训和案例教学等方式,引导党员将历史思维运用到矛盾调解、政策宣讲、基层治理等具体工作场景中,让学习成果转化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效果评估的立体化指标体系

设计包含认知、情感、行为三维度的评估框架:认知维度考察历史规律把握程度、情感维度测量价值认同强度、行为维度追踪服务群众实效。同时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党员学习行为画像,记录学习时长、互动参与、实践转化等数据,并实行的长周期考核,克服短期考核难以捕捉教育成效滞后性的弊端。

(四)资源保障的标准化体系

制定党史学习教育资源配置国家标准:明确各级党组织经费投入占党建经费的比例,规定专职教师与党员数量的配比标准。建立全国红色教育资源云平台,实现教育基地、数字档案、专家资源的跨区共享。实施“红色讲师”资格认证制度,定期开展教学能力等级评定,确保教育质量可持续提升。

四、结语

党史学习教育的制度构建本质是政党文化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通过建立内容动态供给、参与持续激励、效果科学评估、资源均衡配置的制度闭环,方能实现历史教育从政治任务向治理能力的质变,为党长期执政筑牢历史根基与文化根基,真正把党的历史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能力。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数字化背景下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研究

■ 施平

动态呈现等方面的信息,使文化服务具备动态呈现功能,进一步满足不同人群的差异化文化需求。

(三)提升服务互动性与个性化

在数字化背景下,文化馆能更愈发关注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保证了各方之间文化资源供需的平衡。比如,文化馆可通过线上平台,收集群众就文化活动发表的意见与建议,并引导其参与活动策划跟反馈。同时,可借助大数据分析的独特的算法优势,全面了解群众文化偏好与需求,给他们精准推送个性化的文化服务与资源。如县级文化馆可依托微信小程序、村级微信群等轻量化平台,建立数字化服务流程,以“线上预约+线下配送”模式开展服务,提升县级文化馆的服务精准度。

(二)参与激励的双向驱动模型

构建组织约束和个体成长的双重激励模式,需在

源的“搬运”,更要关注传统手艺、民俗活动这些宝贝,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包装。比如,把非遗故事做成动画片、把传统技艺变成能动手玩的小游戏,让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能够穿上新装,自然就能走进普通民众的文化生活。此外,要围绕县域文化资源特点建立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红色文化等分类数据库,方便群众按地域、主题检索资源,解决基层文化资源“散、乱、难找”问题,同时也要强化数字文化资源版权保护,保障文化资源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保证数字文化资源能够在新时代下完成可持续发展。

(三)致力缩小数字化服务鸿沟

为打破传统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的数字化服务短板,以及弥补文化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数字鸿沟,均需要积极开展数字素养培训活动,协助老年群体、农村地方群众等提高数字技能。如开办专门数字技能培训班,教授手机、电脑基础操作,还有怎样运用文化馆线上服务平台;借助“线上+线下”的联合方法,制造更通俗易懂的教学视频和操作指南,便于群众自行了解数字化服务内容。比如,建立县域农家书屋、村党群服务中心,并根据实际需求设置触摸屏一体机,预装县级文化馆数字资源库,使群众可以现场查询文化内容,实现文化服务与阅读服务的数字化融合,让数字服务更便利好用。

综上所述,在数字化背景下的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已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然,面对这种快速的公共文化服务变革,关键仍然在于要积极正视问题,采取有效的优化策略加强数字化建设,并通过服务模式的创新变革,以及提升普通群众的数字素养,不断提升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及经验启示研究

■ 文凯翎 梁明洁

开展艰苦的生产劳动为实施劳动教育提供了历史条件,积累了宝贵且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劳动教育的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

第一,制定相关政策制度,确定劳动教育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开展了必要的生产劳动,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进行劳动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劳动教育的必要性,让劳动教育置于重要地位,提出了“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指导方针,并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制度,例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等制度条例,引导人民参与生产劳动,为劳动活动指明了方向。在“教育与生产结合”方针和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引导下,将劳动融入到教育当中,为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了基本遵循。

第二,开设相关劳动主题课程,制定严格的

劳动计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地的教育部门围绕着“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开设相关的劳动主题课程,将生产劳动作为一门正式课程,制定劳动课程体系,其他课程也紧密围绕生产劳动,并且在课程中制定了具体的劳动计划,对于学生的劳动生产参与以及劳动学习时间都有明确的规定。不仅在教材中增加了生产劳动的知识内容,设置了教学课时数,更是将提升学生劳动技能作为教学目标。

第三,有序推进生产劳动,在劳动实践中加强锻炼。延安时期,由于边区自身困难导致了教育工作难以推进,基础设施不足、教育环境十分恶劣,为了克服重重困难,中国共产党重视生产劳动实践推动劳动教育,特别是面对学生群体的劳动教育工作。陕甘宁边区的大中小学分别有序开展了劳动实践,不仅通过这一方式来解决经济困难、实现经费的自给,还通过结合生产劳动培育学生的劳动观念,提高学生的劳动技能。在劳动实践的开展中,让学生在亲身劳动中

有所收获,不仅考验了学生的思想意识,还培育了学生的劳动技能,提高了学生的劳动知识。

第四,树立劳模典型,发挥榜样示范与价值引领作用。优秀的榜样具有强大的激励力量,对人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能够激励影响人民群众。延安时期,在各地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劳动成绩突出,涌现了一批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为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与生产劳动,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在生产劳动中树立典型,培育和树立榜样模范,并且不断宣传“劳动光荣”等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运用报刊、杂志、文艺作品等多种方式肯定劳动模范、宣传劳动模范的事迹,提高劳动人民的地位,号召人民群众热爱劳动并参与劳动。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劳动教育的经验启示

第一,明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劳动教育的全面领导。延安时期,党对劳动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有效领导,确保劳动教育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当今时代,劳动教育依然需要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劳动教育相关的方针政策,政策作为必须遵守的指导思想和规定的行为准则,在推行劳动教育、弘扬劳动价值观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引领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开展。

第二,坚持榜样教育,学习楷模优秀品质。在延安时期的生产运动当中,各行各业都有劳动模范群体,凝聚出了丰富的劳动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积极投入到生产劳动当中。当今时代的劳动教育应该汲取延安时期典型教育的成功经验,重视榜样教育、树立新时代的劳动楷模,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有效塑造劳动者的正确价值观,引领良好的社会风尚。

第三,探索劳动教育方式,创新多样化劳动教育方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丰富多样的形式来促进劳动教育工作的推进,并收获了良好的育人效果,以生动、高效的方式完成了劳动教育目标。当今时代的劳动教育中,不仅要借鉴延安时期的劳动育人方式,还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创新灵活多样的方法,例如,可以进一步充分发挥电视、电影等多媒体的作用,还可以借助互联网对原有教育模式进行创新突破。除此以外,新时代劳动教育也应当强化劳动实践体验,使群众在劳动实践中养成劳动意识。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